

文章编号:2095-0365(2015)02-0055-05

## 徐志摩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述评

耿宝强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3)

**摘要:**徐志摩与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是五四文学革命中新文学派与《甲寅》派论战的组成部分,是桐城派文学与新文学对立的反映。从思想根源上说,新文学派与章士钊的分歧在于双方社会变革思想的不同。前者属于激进型,后者则是渐进型。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虽不无可取之处,但总起来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结局。

**关键词:**徐志摩;章士钊;信念;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15.02.10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邀请章士钊出任司法总长,不久改任教育总长。从此,章士钊的思想更趋保守,复刊《甲寅》(周刊)以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宣传其恢复旧礼教、复古读经的主张,与新文学派形成了严重的思想对立。于是,产生了新文学派对《甲寅》派——主要是对章士钊本人——连续不断地攻击。其中,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皆有名篇。而徐志摩与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虽仅是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却摇曳多姿,凸显着两人丰赡的才情与博大的胸襟。

### 一、徐志摩的发难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编辑。他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办刊物也想办得热闹。办得热闹,方法很多,挑起论战是最简捷最容易操作的。于是,他挑起了“苏俄仇友”的争论。争论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几近尾声,再争论点什么呢?

冥思苦想之际,他在第17期《甲寅》(周刊)上读到了章士钊《再疏解辑义》。文章是针对美国田纳西州发生的一个案件而发的:法官认定“人是由猴子变来”的说法是荒谬的,原因是《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记载。章士钊由此谈及了人的信念,说:

“兹信念者,亦期于有布局,固不必持绝对之念,本逻辑之律,以绳其为善为恶,或衷于理与否也。”

此前的许多文章,章士钊一贯标举自己热爱旧文学、反对新文学的信念如何坚定。读毕此文,徐志摩心中窃喜:原来章士钊并不是个有基本信念的人,否则,他不会“固不必持绝对之念”地认为信念可以随意改变。于是,他立刻写了《守旧与“玩”旧》,刊在11月11日的《晨报副刊》上。

徐志摩曾把自己的笔比成“最不受羁绊的一匹野马”,他的散文也就有了“跑野马”的风格,思维、想像如野马般自由驰骋。评论性散文,他是最不擅写的,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何文何处,他都是太多太热的感情压过事理。但即使如此,“跑野马”的本色是不会丢的,《守旧与“玩”旧》亦是如此。

他先以走路作比喻,笼统地讲了一大通关于信念的道理。说古典派或旧派“跟前面人走,信任他是认识路的”,浪漫派或新派“走自己的路,相信自己有能力认识路的”。“这两种办法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只是人先天性情上或后天嗜好上的区别”;但两者都少不了一个“信”字:一个得相信“领他路的那个人是对的,另一个则必须相信“他自己是对的”。

承接旧派新派的说法,他说旧派“在思想上

收稿日期:2015-02-18

作者简介:耿宝强(1968—),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本文信息:耿宝强.徐志摩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述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2):55-58.

抱住古代留下来的几根大柱子”，并不可笑。但如果“抱错了柱子，把假的认作真的”，就难免伊索寓言里的那条“把肉骨头在水里的影子认为是真的”，差点淹死的狗的命运。然后，他荡开一笔，说“那狗，虽则笨，虽则可笑，至少还有它诚实的德性：它的确相信那河里的骨头影子是一条真骨头。”如果那条狗“学会了骗人上当，明知道水里的不是真骨头”，却偏偏“示意与他一同站在桥上的狗朋友们”，“叫他们跳下水去吃肉骨头影子，它自己倒反站在旁边看趣剧作乐……那时我们对它的举动能否拍掌，对它的态度与存心能否容许？他感叹说：“有许多畜生比普通人们……更有道德，更诚实，更有义气，更有趣味，更像人！”

铺垫至此，终于点出了章士钊，但徐志摩依然不直接入题。他先是自谦说，自认是“根器浅薄之流”，向来不敢挑战“思想界的权威者”，孤桐先生（即章士钊）的议论与主张，很多是他不敢苟同的，只是一向忍着不说话，这回是实在忍不住了。然后说，他对于孤桐先生一向是存了十二分敬意的，虽则明知两人在思想上是不同道的，“这敬仰他因为他是个合格的敌人。在他身上，我常常想，我们至少认识了一个不苟且、负责任的作者，在他的文字里，我们至少看着了旧派思想部分的表现。”

跑到这里，徐志摩终于点出了要害，“这回我自认我对于孤桐，不仅他的大道，并且他思想的基本态度，根本的失望了！”还不忘俏皮一下，“而且这失望在我是一种深刻的幻灭的苦痛。美丽的安琪儿的腿，这样看来，原来是泥做的！”至于失望的原因，他掷地有声：“孤桐先生思想上没有基本信念！”

思想上没有基本信念的孤桐先生为什么还口口声声坚守信念呢？徐志摩意犹未尽，深刻起来，也刻薄了起来，他指出：孤桐先生没有些微思想的独立，只是一个“实际政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操剥复之机，妙调和之用”；而“一个‘实际政家’往往就是一个‘投机政家’”；这样的人，“不但没权利充任思想的领袖，并且不能在思想界里占任何的位置”；这样的人，既然和那条诱骗朋友跳进水里去送命的狗一样，“我想，我们决不能轻易容许了吧！”

## 二、章士钊的答复

1920年秋，徐志摩赴英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

学院学习期间认识了章士钊，又经章士钊的介绍认识了对他影响甚大的英国作家威尔士。两人是很好的朋友，章士钊不喜欢白话诗，但很喜欢徐志摩。回国伊始，徐志摩的《康桥再会吧》、《哀曼殊斐尔》等诗，以优美的旋律、曼妙的情调、新奇的想象，引起了文坛的关注，章士钊曾写信给徐志摩，称他为“慧业文人”，称赞其文学天才并欣喜其与文学结缘。既然如此，徐志摩为什么会如此刻薄地批判之？

20世纪初的20年间，章士钊是著名的文章大家。胡适很推崇他的文章，说其文兼有梁启超的条理与章炳麟的谨严，是梁启超之后1905年到1915年这十年间政论文章的代表作家。<sup>[1]</sup>

新文学运动的目标之一是用白话取代文言，主张将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提倡以白话作文作诗。章士钊却认为：白话“以驳冗为高”、“以纷淆为尚”，以之写出“凡长言咏叹，手舞足蹈令人百读而不厌”的美文，“难如登天”；文言则“贵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sup>[2]195-201</sup>。因此，如果说有应该消亡的，也该是白话而不是文言。

在文学观念上，新文学派与章士钊的分歧也不可调和。前者主张用“思想”和“情感”取代“文以载道”，后者却认为文章中非载此“道”不行。前者倡导文学进化，“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sup>[3]21</sup>后者却说：“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为古人之言，而扩充变化者也”<sup>[4]442</sup>，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今人摹仿前人的历史。前者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sup>[3]21</sup>；后者则认为，“文家之能臻是域，关键全在选词”<sup>[4]445</sup>；前者主张关心社会现实的“写实文学”，后者则强调文章的声调、节奏、格律、辞藻，提倡“形式文学”；前者提倡个性解放、颂扬人性的“人的文学”；后者却认为高扬人性，就会放逐人的欲望，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和社会动乱，因此必须用礼教来束缚人欲。

京师大学堂创办的时候，还是清末，因此，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北大学术的主流。这种状况，直到民国初年太炎弟子先后进入北大才开始改变，但桐城派余威犹存。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派的最后一批传人，章士钊在1917年任教北大

就是明证。桐城派在清代文坛影响极大,其“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长盛不衰。五四新文学从发生学上来说,就是从攻击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所总结的“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开始的。也就是说,文学革命,革的就是桐城派与选学派的命。

因此,可以说,章士钊反对新文学,实际上是文学革命时期桐城派文学与新文学对立的反应。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章士钊为什么在1925年7月《甲寅》(周刊)的征文告白中明确表示:不收白话文;在《评新文化运动》等文章中,更说新文学创作是“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

这样一个新文学的反对派,面对徐志摩的发难,当然不可能心平气和。读毕《守旧与“玩”旧》,他立刻写了《答志摩》刊在《甲寅》(周刊)1925年第18期上。他的行文,没有徐志摩的婉曲多姿与尖锐刻薄,却有着比徐志摩更雍容的风度,更缜密的说理。

文章开头,他先把徐志摩恭维了一番,“徐君志摩,今日顾厨之首选也”,其文章“能外于红楼、水浒,自辟理路,发为庄论”,是“自白话兴行而来”,“使人读之终篇,心意不恶”,“吾见实罕”的好文章。然后他“别以一、二要义”来答复志摩。

其一,他说现在世界的学者,有一个通病,就是凡事都要附会一个主义,真正的学术因之变得溃败不堪。中国文坛白话文的泛滥,日报副刊的拖沓,便是这种风气流入,进而蔓延的结果。他举某画报上的一幅罗丹的雕刻作品为例说:这样“男女裸抱,下交投而上接吻,筋肉颤动,淫情欲活”的艺术,恐怕会将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鉴赏力尚差的青年断送了。他铺延开去说,他所见到亲戚故旧中,如徐志摩所说,“完全相信自己是对的”,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的,罕有善终的。然后揶揄说:“‘浪漫派或新派’所造之假骨,招致诸狗而毙焉者,岂不然哉?”

其二,他说世间的任何教义或学说,都不会是绝对真理,而必须“与时为缘”;但“今志摩犹美其词曰思想本身。试问思想不以时表之,本身有何真值?即有真值,于人生果复何取?……未见道与时无需,而徒以本身有何性何质。人乃钻研顶礼,视同性命。柳子厚有云,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昭此义也。”

最后,针对徐志摩所说的,无基本信念之人,“不但没权利充任思想的领袖,并且不能在思想界里占任何的位置”,他说,“领袖之说”“根本外于论点”;“此而有权,请得彻底放弃”,并嘲讽曰,自己在思想界的位置,“其权又自志摩与其同派人操之,非余之所敢知也”。

### 三、分歧的本质

章士钊反对白话文学运动,遭到了新文学阵营的严厉反击。

胡适发表《老章又反叛了》,批评章士钊“揆弗读,读亦弗卒”陈源的作品,却先赞他“屡有佳文”,继而又骂他作“恶滥之白话文”,并由此断言,“章君全失‘雅量’,只闹意气,全不讲逻辑了。”<sup>[2]203-206</sup>

吴稚晖则在《国语》周刊上给章士钊发了一则讪告:“……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哀此讪闻。”又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章先生近来的反动,拿腐败的理论来批评他,必是年来半夜里‘散局’回家,路上撞着了徐桐,刚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做主。”<sup>[5]</sup>

鲁迅在《再来一次》中订正了章士钊对“二桃杀三士”的解释,反击了其“文言优长”的论调。<sup>[6]</sup>又在《答KS君信》中预言说:“……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做讪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sup>[7]</sup>

反驳章士钊的还有陈独秀、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历史已经证明,随着段祺瑞政府的垮台,章士钊黯然下课,《甲寅》周刊不久停刊,他所反对的白话文学完全取代了他所提倡的文言文。

所以如此,除了新文学派的集团式攻击以外,更主要的是章士钊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主张虽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总体上就像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一样,是违逆历史潮流的。

从思想根源上说,章士钊与新文学派的分歧在于双方社会变革思想的不同。鸦片战争以降,尤其甲午海战以后,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社会变革思想。一种是激进型的,主张以西方的模式全面彻底地改造现实世界;一种是渐进型的,认为社会进步与发展宜稳健,不宜冒进,主张小规模调整或阶段性的革新。<sup>[8]</sup>前者认为,理想与现实、新文化与旧文化势不两立,不能并列与调和;要建设

新文化,就必须与过去的传统决裂。新文化运动遵循的是破旧立新和弃旧图新的社会变革思维方式,即属激进型。陈独秀认为,两种文化绝无调和的余地,坚决主张用西方文化全面取代、置换中国文化。<sup>[9]136</sup>胡适则认为,调和论会助长人的惰性,使人不思进取,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sup>[10]110-111</sup>

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则是渐进型的。在他看来,社会发展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今日之社会”必须“由前代之社会嬗蜕而来”。<sup>[11]</sup>因此,他对待历史和传统的态度,与新文化派截然不同。他认为,既不能全盘舍弃旧文化,也不能完全抛弃新文化,而应该将其调和,并注意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保护旧文化,在新文化中融入旧文化。这与新文化运动否定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截然对立,文学主张上的分歧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是章士钊批评新文学运动的根源。

客观而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渐进型与激进型,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各有偏颇。章士钊强调社会发展的延续性,这是正确的,但忽视了变革,并由此形成了他偏于保守的新旧杂糅调和论。新旧杂糅,再加上调和,表面上看兼顾了创新与保旧,但在两者之间,他并未一碗水端平,而是以旧为本。<sup>[12]</sup>新文化派强调创新,显现了变革社会的勇气,对推动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忽视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又毫无疑问是偏颇的。文化的进程只能是延续与变革的辩证统一。从这一点来看,胡适“百事不如人”<sup>[10]280</sup>、陈独秀“一一除旧布新”<sup>[9]153</sup>也罢,鲁迅“少看或不看中国书”<sup>[13]</sup>、钱玄同废汉文<sup>[14]</sup>也罢,都存在着忽略社会发展和文化进程中的延续性的弱点。

#### 参考文献:

- [1] 胡适. 胡适文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328.
- [2] 郑振铎.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17-1927)[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3] 胡适.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化运动[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4] 蔡尚思.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5] 邹小站. 章士钊传[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224.
- [6] 鲁迅. 再来一次[J]. 莽原(半月刊), 1926(11):

#### 四、论争之后

读毕《答志摩》,徐志摩特意用文言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纵有论战,言辞不免激烈,章士钊毕竟是声望颇高的前辈,毕竟是卓有盛名的政论作家,毕竟是相交不短也不浅的朋友。所以,徐志摩对他还是友好的,依然说他“毕竟是可人”。观点不同进行论争是一回事,对人的尊重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互不相干。这就是徐志摩!他最反感在学术论争中掺杂进个人的好恶。很多人对他这一点颇有訾议,徐君远说:“为‘晨副’他挨过骂,为译曼殊斐儿的小说他挨过骂,甚至于用文言给《老虎报》(甲寅)总编辑写封信也要挨骂。他挨过不少的骂,受了不少的讥讪(可怕的讥讪!)。朋友们全为他不平,而他独能泰然处之。记得一次一位文学家在《京报》副刊批评我的小说,我很生气,写信给志摩,他劝我说,‘你只管作,他只管骂,单看他骂的好玩不好玩。’是的,这就是他对待敌人优容的态度,而‘好玩’这两个字乃是他自己解嘲的秘诀——这并不是怯懦,这是旁人不能及的好德性。”<sup>[15]</sup>即使如此,他也没有中断和章士钊的联系,与陆小曼结婚南归后,依然有书信往来。1927年12月16日致章士钊的信中,尚有“《甲寅》又崛起,毅勇可佩”的贺语。徐志摩英年早逝,章士钊特意撰写了挽联:器利国滋昏,事同无定河边,虾种横行,壮志奈何齐粉化;文章交有道,忆到南皮宴上,龙头先去,新诗至竟结缘难。内心是悲痛的,评价是很高的。作为一代文章大家,章士钊一生写得挽联很少,其余几位是:张勋、孙中山、宋教仁、蒋百里、戴笠、徐悲鸿。可见徐志摩在他心中的地位。

479-485.

- [7] 鲁迅. 答KS君信[J]. 莽原(周刊),1925(19):8.
- [8] 高力克. 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
- [9] 陈独秀.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10] 胡适. 胡适选集[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 [11] 章士钊. 进化与调和[J]. 甲寅(周刊),1925,15(1):4-7.
- [12] 章士钊. 新时代之青年[J]. 东方杂志,1919,11(16):159-164.

(下转第80页)

## 参考文献:

- [1]秦佑国. 声景学的范畴[J]. 建筑学报, 2005(1):45-46. [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2]高力强, 刘瑞杰, 彭鹏. 从清李周望祠堂探析其儒家教育思想[J]. 时代文学, 2010(6):169-170. [4]宋剑玮, 马蕙, 冯寅. 声景观综述[J]. 噪声与振动控制, 2012, 32(5):16-20.  
 [3]陈力军. 清明上河话红尘: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赏析

## Research on the Soundscape of *Along the River During Ching Ming Festival*

GAO Li-qiang<sup>1,2</sup>, MA Hui<sup>2</sup>, ZHU Han<sup>3</sup>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3. Tianjin TV, Tianjin 3002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NKI database (1979—2013), there is short of research on *Along the River during Ching Ming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ndscape. According to the momentum and romantic charm of depicting scenes in the picture *Along the River during Ching Ming Festival*, using the R. Murray Schafer's soundscape classification method, combing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scenes properties, diverse sounds and all stage of sound distribution are extracted sequentially.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Hongqiao scene as an examp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hape and sound in the pictur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of the picture are analyzed to find that the feature of soundscape expression in this painting is significant. Soundscape provides a bran-new research mode and perspective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s, which should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Art researchers.

**Key words:** soundscape; *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R. Murray Schafer; sound node

(上接第 58 页)

- [13]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135.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417.  
 [14]蔡尚思.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M]. 杭州: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205-206. [15]张放. 朋友心中的徐志摩[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205-206.

## Review on the Controversy Over Beliefs Between Xu Zhimo and Zhang Shizhao

GENG Bao-qiang

(Humanity Department,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over beliefs between Xu Zhimo and Zhang Shizhao was a component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New Literature School and the Jiayin School during the "May 4th" literature revolution, and it was the reflection of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ongcheng Literature School and the New Literature School as well. From the point of origin of thoughts,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New Literature School and Zhang Shizhao originated from difference of thoughts on the social revolution. The former was radical while the latter preferred to progress step by step. Zhang Shizhao's thought on social revolution, though having some merits, was contrary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to lead to a failure end inevitably.

**Key words:** Xu Zhimo; Zhang Shizhao, belief; controversy